

人工智能发展抑制经济伦理失范的实证研究

夏宇轩

安庆师范大学，安徽 安庆 246133

摘要：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推动了经济进步的同时，也抑制了经济伦理失范现象的发生。本文基于2014-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从收入与财富分配、环境保护、劳动力市场与就业、社会安全与法治四个维度构建我国经济伦理失范指标体系并测度分析，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探究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对经济伦理失范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发展对经济伦理失范有着抑制效应，即人工智能发展抑制了经济伦理失范；人工智能发展在近几个发达地区人工智能抑制经济伦理失范作用更加显著；人工智能发展可通过产业结构和研发投入强度间接抑制经济伦理失范。因此，应建立以人工智能发展为核心的差异化区域治理框架，完善技术治理的制度体系，促进技术创新与伦理建设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经济伦理失范；中介效应

DOI: 10.63887/jfem.2025.1.2.1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与社会深度变革的重要力量。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主旨演讲。该倡议指出，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发展的新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深刻影响经济社会与文明进步，也伴随着不可预见的伦理风险与治理挑战。实际上，技术进步在提升治理效能、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可能冲击原有的伦理规范。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发展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对经济伦理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亟需深入探讨其在伦理治理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路径。

一、文献述评

人工智能与伦理的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郑世林（2023）认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生产率、技术创新、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市场结构与产业组织以及法律规则和秩序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1]。Floridi等（2018）人从人文伦理的角度将人工智能产生的风险归纳为四类：轻视人类的技能价值、

剥夺人类责任、削弱人类控制、侵蚀人类自主权^[2]。这些风险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伦理基础。Hinton（2023）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生成式AI和大语言模型的兴起，人工智能系统已经能够模拟人类的思维和决策过程，甚至在某些领域表现出超越人类的能力^[3]。这些学者的研究揭示了人工智能发展在经济、社会和伦理层面可能引发的深远变革，并提出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要更加重视伦理风险的防范。

国内学者同样重视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研究，但与国外相比，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起步较晚，主要从2017年左右才开始丰富起来。学术界主要从以下两个维度对该问题展开了探讨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一，主张底线思维，认为应优先抑制恶行而非推广善行，放缓技术发展速度，集中考虑规范智能机器的方式并限制其能力，确保所有涉及人类自由和身心安全的事务必须由人类亲自完成。这种观点强调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将人类的利益和安全放在首位，避免因过度追求技术进步而忽视伦理约束。其二，强调对人工智能

及其应用后果进行全面的价值反思，制定智能社会的价值准则和应对措施，遵循人本、公正、透明、知情同意和责任等原则，使人工智能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这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需要技术上的突破，还需要在伦理层面建立一套完善的价值体系，以确保技术的应用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在推动经济发展和提升生产效率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人工智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市场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等方面，有助于抑制传统经济领域中的不正当行为，如腐败、欺诈和不公平竞争等。因此，在经济活动中引入人工智能，能够有效规范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降低道德风险，提升社会公正。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在当前的全球经济中，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对经济伦理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从数字经济时代的伦理治理需求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经济伦理的实践环境和运行机

制。人工智能通过算法决策、数据驱动和智能反馈等方式，参与到社会资源配置、商业决策、公共治理等多个环节中，其在效率与精准性上的优势，为提升伦理治理的科学性与可行性提供了技术支撑。其次，人工智能的发展便于政府实施公共政策分析和执行。人工智能技术的逻辑是依托算法和数据，促进制定精准政策。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大量多源异构数据的采集、整合和深度分析，极大地提高了政府公共政策分析的科学性与精准性。最后，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司法公正和透明度^[4]，人工智能可通过对大量历史判例、法律条文及案件特征的智能分析，辅助法官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一致性裁决。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人工智能发展抑制经济伦理失范。

三、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人工智能发展对经济伦理失范的影响，本文以全国 30 个省市（西藏、香港、澳门、台湾除外）的数据为样本，构建如下模型进行分析：

$$EEDI_{it} = \beta_0 + \beta_1 AIDI_{it} + \beta_2 X_{it} + \gamma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1)$$

其中， i 代表省份， t 代表时间， $EEDI$ 代表经济伦理失范，用于衡量经济伦理失范的程度； $AIDI$ 代表人工智能发展； β_0 代表截距项， β_1 代表人工智能发展的系数， β_2 代表控制变量系数； X_{it} 代表ECO、SOCIAL、GOI、UR、CPI控制变量； γ_i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 λ_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代表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经济伦理失范（EEDI）。本文结合前文相关理论文献构建了包括收入与财富分配、环境保护、劳动力市场与就业、社会安全与法治四方面8个二级指标构成的经济伦理失范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所示。

表 1 经济伦理失范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收入与财富分配	X_1 收入差距（泰勒指数）	正向
环境保护	X_2 工业二氧化硫（万吨）	正向
	X_3 工业废水（万吨）	正向
	X_4 工业烟粉尘（万吨）	正向
	X_5 碳排放量（万吨）	正向

劳动力市场与就业	X ₆ 城镇登记失业率 (%)	正向
社会安全与法治	X ₇ 贪污腐败/职务犯罪案件数量 (件)	正向
	X ₈ 信息网络犯罪率 (%)	正向

2 解释变量

人工智能发展 (AIDI)。本文结合人工智能相关文献研究,并参考吕荣杰等^[5]的研究成果,设定了由技术发展、产业应用、政策支持与人力资源三个维度构成的评价体系,共包含12个二级指标,用于对2014-2021年全国30个省市(西藏、香港、澳门、台湾除外)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进行测算。

3 控制变量

在研究人工智能发展对经济伦理失范的影响时,为了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需要考虑并控制其他可能影响经济伦理失范的因素。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ECO); 社会消费水平 (SOCIAL); 政府干预程度 (GOI); 城镇化率 (UR); 消费者消费指数 (CPI)。

(三) 数据来源

本文针对2014-2021年中国30个省市(西藏除外)展开研究,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检察年鉴》、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各省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官网等,为了确保分析的稳健性,本研究对人工智能发展程度评价体系和经济伦理失范评价体系数据先用熵权法计算,再进行标准化处理,并使用移动平均法对个别缺失的数据进行填补。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省级层面基准回归

在固定效应回归中,第一列未加入控制变量,第二列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表2显示,人工智能发展指标对经济伦理失范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说明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经济活动中违背伦理规范的现象呈现出减少趋势,这可能得益于人工智能在提升监管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强化责任追溯机制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假设H1得到验证。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固定效应	
AIDI	-0.286*** (-6.36)	-0.121*** (-4.190)
ECO		0.144*** (1.110)
SOCIAL		0.017 (0.660)
GOI		-0.332*** (-4.740)
UR		-0.618*** (-12.300)
CPI		-0.083*** (-3.830)

_cons	0.390*** (63.420)	0.608*** (14.440)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N	240	240
R ²	0.437	0.808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4-2021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人工智能发展抑制经济伦理失范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显著抑制了经济伦理失范,随着人工智能水平的提升,经济伦理失范的程度越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构建以人工智能发展为核心的差异化区域治理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差异化区域治理框架下,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多维度的制度设计与协调机制。第二,应

在能力建设与社会参与中深化“科技—伦理—治理”协同,以构建高效遏制经济伦理失范的社会共治格局。要完善人工智能伦理人才培养体系,提升技术与监管人员的伦理风险识别与应对能力。第三,完善技术治理的制度体系,是有效防范人工智能引发经济伦理失范问题的根本保障。人工智能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可能因算法不透明、数据滥用等问题带来资源配置不公、责任不清等伦理风险。因此,亟需构建科学、系统、前瞻的技术治理制度,在顶层设计中明确伦理边界,在操作层面建立覆盖研发、部署与应用全过程的监管机制,确保技术发展服务于公共利益与社会正义。

参考文献

- [1]郑世林,姚守宇,王春峰.ChatGPT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影响[J].产业经济评论,2023,(03):5-21.
- [2]Floridi L, Cowls J, Beltrametti M, et al. AI4People—An ethical framework for a good AI society: Opportunities, risks, principles, and recommendations[J]. Minds and Machines, 2018,28(4): 689-707.
- [3]Patrick H .Generative AI and Wargaming: What is it Good For?[J].The RUSI Journal,2023,168(7):34-41.
- [4]何怀宏.人物、人际与人机关系——从伦理角度看人工智能[J].探索与争鸣,2018,(07):27-34+142.
- [5]孙伟平.关于人工智能的价值反思[J].哲学研究,2017,(10):120-126.